



一个人与一代人的起点

□陈希米

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全集,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给自己的爱人做全集,这是人生难得的可能。我告诫自己,这样的机会,无论怎样都该珍惜。

然而终于着手开始的时候,又一次遭遇对什么事都懈怠迷惑的虚无感。发现对编全集这件事,无论目的还是方法,自己都不甚清晰。

为什么要编全集?我不知道史铁生自己是否会极赞同此事,但知道他至少不会很反对。做全集和不一定做全集的理由都很多。我相信,一个人写出的好东西必定是少的;值得一版再版的更少;而那些“全部”的边沿和角落,其价值和证据性都很有限。此外,多年来我俩对作品资料的存档和整理多有疏忽,也构成了不小的障碍。

总之,我的热情和能力都远远不够。

但是,只要有可能,把史铁生的文字整理聚拢起来,终究该是合理的行为,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也无疑应尽全力。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杨柳,感谢我的同学钟晶晶,感谢我的同事田娟华,感谢老朋友孙立哲、柏晓晓……没有你们,这个全集将会有许多重要的遗憾。

感谢北京出版社的诸位编辑,没有你们的细心负责,没有你们加班加点,这个全集肯定无法按计划的时间出版。

最要感谢的是隋丽君老师。她的热忱、敏锐、严谨、坚韧在这个全集从启动到完成的每一个细节里都给了我深刻的教益。能够遇到这样的编辑,是我的幸运,更是史铁生的幸运。

现在这个全集,主要辑入的当然是曾经在各处发表过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不同时期都进入过不同选本。此次出版,按照隋丽君老师的要求,凡史铁生用电脑之后创作的作品,全部采用电脑里的原始文件,纠正了之前各类版本存留的错、漏、疑。对原始稿件的存疑,还参照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当代作家系列·史铁生系列》做了校订。

此次新编新收,需要说明的主要有几点:

1.收入了史铁生早期创作的剧本、小说等,这些作品此前从未进入过任何选本。

2.收入了新收集到的书信70余封。

3.恢复了长篇小说《务虚笔记》第一次发表时因故删去或修改的部分文字,散见在该书三个章节里。这是史铁生明确的意愿。



2006年,史铁生在家



史铁生的自画像

4.史铁生看书时会把一些感想写在书页空白处,偶尔也会零散地记一点在电脑里,这次选了一部分还算连贯的“碎片”,冠以“读书卡片”和“页边笔记”收进杂记卷。也不知道有没有意义。

5.选了一点好玩的东西:偶尔的涂鸦,给朋友画的贺年卡,信手做的打油诗,透析时写的手机短信等。这些“不登大雅”的东西也凑在全集里了,不知是否合适。

6.在未竟稿卷,收录了一部分史铁生尚未最终完成、发表的作品。还有个别篇目,如小小说、诗歌等,因数量少,均按编辑体例辑入相应卷册,且都做了未刊说明。

7.关于访谈卷。这一部分应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作品。此次收进来的绝大多数是经史铁生本人校订过的谈话记录,也算反映了他的一些想法以及生活状态。

8.对个别明显不合理的错谬,在不违背原意的前提下,编者或编辑做了未加注明的修正。特别是对有些文字用法不一的地方,尽量做了局部统一。个别确实无法辨认、修正的可能错讹,则保持了原样,加注了说明。

9.遵照编辑要求,增加了必要的编者注;无法确定写作日期的,只能空缺;或为当事人,隐去了一些人名。

在这个全集里,有些文字,比如在上世纪70年代写的书信,现在读来显得幼稚、无知;还有一些文字,或许是偏见、浅见。有编辑提出删去,我想还是保留原样吧。因为史铁生自己曾在1994年为《史铁生作品集》写的《作者后记》中说:“很多篇章已不忍卒读,但放弃如同遮丑,反促幼稚长成诡诈,想想实在不好。况且,走向未来不该以贬损过去为快意、为轻装,就如同任何时候也不能对初恋的痴与悲喜轻描淡写。”我以为,这个态度,到今天,即使过去了21年,他也应该不会改变。我还想,这倒是能够看出一个人的起点,那一代人的起点。

虽然各位参与者全力尽心,全集也不可能做到真正“全”,遗憾和错漏难免,但愿以后有机会不断弥补、完善。

最后想记一笔的是,在史铁生的电脑里,未竟稿的word文档最后修改时间是:2010年12月30日,9:35:58——这是他最后干活的时刻。

有最后,才会有全集。

他已经去世5年,5年没有再往前走。今后还会有更长的时间止步不前……

(《史铁生全集》,史铁生著,北京出版社出版)

回望与回归

□王樵夫

下自己人生中的一小段时光。”

“乡村三部曲”中所有的故事,其实早已在安宁的生命中根深蒂固,它们像宝藏一样,安静地等待某一天主人将他们想起。历经了10年,那些被时光与记忆一起发酵之后的醇厚记忆,被安宁真实地记录下来,于是有了《乡村三部曲》第一部《我们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但是,关于

故乡的记忆里,依然有很多的灵感与素材,葳蕤茂盛地生长着,安宁热爱世间一切有灵的生命,她从乡下那些构成日常生活植物与动物的身上,看到了更多的生命光泽,促使她继续写出《遗忘在乡下的植物》,写下了生机勃勃的故乡那些温暖湿润的记忆。尔后,她又继续完成了《乡野闲人》。至此,“乡村三部曲”全部完成。

安宁不知道这算不算告别,向千里之外的故乡。她说:“我热爱我生活过的这个地方,我20年的光阴,与他们一日为伍,我将他们一一记下,便觉得自己像一只虫子寻到了湿润的泥土,觉得这个世界是安稳的,也是可以忘记的。”

黄永玉说:“在文学上我依靠永不枯竭的、古老的故乡思维。”故乡思维是什么?既是一个炊烟袅袅、鸡鸣犬吠的村庄,也是一个野性的、世俗的、吵嚷的村

庄;既是乡村生活中惯常的丧事、分家、走亲戚,也是风中摇曳的玉米、麦子、高粱,草丛中跳动的蛐蛐和蚂蚁。安宁以一个在场者的姿态,用她优美的文字,把我们遗忘的故乡一点点地挖掘出来,呈现在读者的眼前。她的这种写作,有时候会让我们忽视了作者的个体存在,而沉浸在属于一代人的集体回忆中。

安宁作为一名年轻的女作家,回望乡村故土时候的注视角度与情感方式却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坚硬感。她不躲藏不隐瞒,敢于直面村庄以及人性并不美好的一面,比如写家人、写自己、写闲人们,那些小小的情感、故事、矛盾甚至冲突,在一种冷静、客观,甚至可以说是锐利的笔调中,勾勒出乡村独有的景象。这种本色写作反而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达到另类的审美效果。

她坦然地把底层农民的命运、浓郁的乡村气息与复杂的人情世故糅合在一起,用一种朴素自在的话语方式描绘着各种生活细节,有故事,有景象,有情感,有情绪。

安宁以细微敏锐的洞察力,以幽默、自嘲与嬉笑的写作色调,捕捉到众生百态的欢颜愁容,树立了以乡村市井小民为主

轴、“非英雄”式主角的创作典型。她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那些生活在底层,人生道路充满曲折、辛酸,却用乐观的心情和幽默的话语来化解苦闷的人。她为这些人创造了一个新词:乡野闲人。

“这些人有些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永远地消失了,他们没有墓碑,甚至有的连坟墓亦被夷为平地;有些早已离开村庄,再也不曾回来。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他们连一粒微尘也不是。”她笔下的小人物或要饭的或修鞋的,或吹唢呐的或玩戏法的,在时代流转下如烟雾升起淡去,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可是,安宁却用无数个夜晚,慢慢挖掘出这些微尘在消失之前闪现出的光泽和温度。

安宁的“乡村三部曲”,这种密集的写作,并没有让读者产生对乡村生活的审美疲劳,反而如楔子一样,进一步钉牢了人们久远的乡村印象,从而使那些渐渐淡去的生活在人们的记忆中愈加鲜活清晰。

从小小的村庄到城市的迁徙过程中,种种的际遇,让安宁的人生纠集了太多的辛苦与矛盾。她自言,“就像我不喜欢自己的固执、倔强、悲观、焦虑与孤独,却明白所有的一切,都源自不可逃避的乡村生活。它们影响了我20多年,也必将延伸至一生的旅程。”而她始终以迎面而上的姿态挣扎其中。乡村三部曲,既是从乡村迁徙至城市、并且不会再返回乡村生活的代人,向故乡的深情回望;更是作家安宁在无法扎根去的城市孤独中,溯源而上,对生命源头的回归。

虚实相生 见证历史

□敖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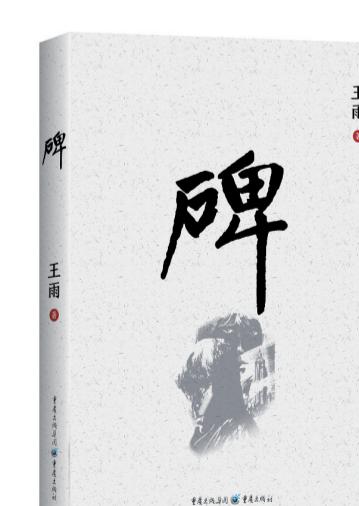
统天下,历史与现实的真实越来越多溶入小说,在幻象的架构中承担着更重要的作用。这不仅由于读者对历史生发亲近感,也由于历史真实亟须打捞与抢救。”王雨新作之《碑》正表现出这样的特质。

小说叙述故事,总是靠人物支撑的,写小说就是写人物,《碑》集中笔墨塑造了抗日英雄宁孝原。作为宁氏家族传人,即《开埠》主人公宁承忠的第四代孙,宁孝原突出的思想性格正是宁承忠爱国情怀的承袭与光大。《开埠》以时为要关监督的宁承忠扣押69艘外国走私货船起笔,表现其爱国御侮精神;《碑》以宁孝原从抗战前线负伤归来开篇,昭示其保家卫国、勇敢无畏的英雄本色。这个宁孝原“从小就喜欢武器”,“对陆海空武器一无所知”,“对武器一无所知”。全民抗战时期考进重庆大学,更当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熏陶。重大毕业后随即参军入伍,先是川军,之后进入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晋升为师参谋长。作为一名赴前线抗日的战将,他与日军肉搏,“日本鬼子的刺刀在他身上留下11道伤口”,这都是其爱国热情与“总感到打仗痛快”的豪爽性格使然。在他心爱的两个女人眼

中,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他被降职后,成为冯玉祥的贴身副官,自然受到冯玉祥将军思想、行动的影响。重庆解放后,宁孝原在共产党人黎江的教育感召下,终于投入共产党怀抱,成为共产党特意留在党外做民族资本家统战工作的功臣。应该说这种归宿是顺理成章的。

不过,上述种种还仅是宁孝原形象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恰如宁孝原自己所说,他曾是“浪荡公子哥儿一个”。这种“浪荡公子哥儿”的特点,具体表现在对他倪红、赵雯两个女人的态度上。他深爱倪红,亲手把家传宝物交她保管,并在碑前立誓,“非倪红不娶”。可当他见到姿色比倪红更美更具女人气质的赵雯后,却又一门心思扑到赵雯身上,一心一意要娶赵雯为妻,只想把倪红纳为身边小妾。“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作家的审美创造毕竟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生活。这不仅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真正卓有建树的浪漫主义乃至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亦是如此。

《碑》中艺术形象除了宁孝原,还有倪红、赵雯、涂姐、黎江以及袁哲弘、窦世达等许多虚构人物。他们或为普通群众,或



为中共党员,或为国民党特工,或为叛国投敌汉奸,作者的描写,大都超越过去许多文学作品对所谓正、反面人物类型化、脸谱化的简单处理。

一部讲述抗战至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庆故事的小说,以《碑》命名是富含深意的。今日屹立于重庆市中心的“人民解放纪念碑”,体现的是重庆人民、华夏儿女不屈不挠反抗外敌侵略,谋求祖国独立富强、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精神。碑的变迁是绝好的历史见证。

(《碑》,王雨著,重庆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王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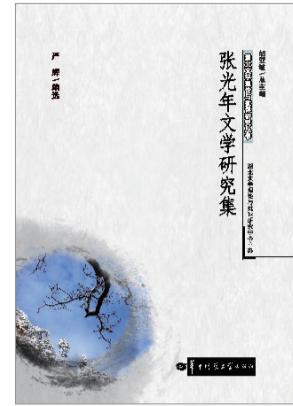
重庆出版社

2017年10月出版

■新书快读

主持:黎华

《张光年文学研究集》



严辉 编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6月出版

《张光年文学研究集》作为湖北省人文社会学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组织编撰的“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丛书”之一种,全面反映了张光年文学研究的整体学术面貌。本书注重内容的完整性、准确性和权威性,编选者多年潜心整理研究,搜集了大量第一手历史资料,其中部分篇目为新近发现后的首次刊行,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张光年,笔名光未然,湖北老河口人,中国现当代著名诗人、文学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胡亚敏教授为该丛书作序时说:“让近代以来湖北籍作家的创作成就得到应有的重视”,《张光年文学研究集》正是这一学术构想的重要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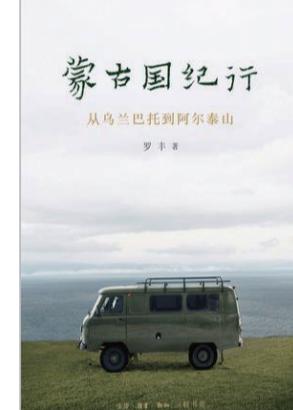
《贾想II》



贾樟柯 著
台海出版社
2018年1月出版

本书收录了贾樟柯在2008年到2016年间的文章、演讲与对谈,这些与电影作品并行的文字,记录下他电影内外的生活和思索、对于历史和社会剧变的关怀和反思,呈现出更为广阔和深厚的生命底色,也揭示出他电影的缘起和归宿。在电影中,贾樟柯记录下大时代里的个人和被时光遗忘的生命细节,叙述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放下摄影机,拿起笔,烟雾氤氲中,思绪飘回汾阳的街道、北京的胡同,追忆县城的少年、百无聊赖的青春,缅怀文学启蒙的恩师,感叹与侯孝贤、杨德昌等前辈的交往与遗憾,也直白道明以电影打捞历史细节、对抗遗忘和反思历史的初衷。

《蒙古国纪行》



罗丰 著
三联书店出版社
2018年1月出版

2006年夏的蒙古国考察,是一次以中国学者为主、多国多学科人员共同参与的蒙古历史考察之旅,历时14天,行程2800公里。考古学者罗丰以详实丰瞻的旅行笔记为基础写成此书,生动记述了一行人的甘苦和收获。一路上作者笔不离手,不放过点滴的个人感受和生活细节,他追慕前辈科学探险学者的风范,悉心记录游牧生活特有的风土人情,壮丽苍茫的草原美景,以及先民留下来的鹿石、碑铭、遗址、墓葬等,配合大量照片、手绘图片,使这部纪行成为一部难得的科考笔记佳作。

罗丰不仅是一位考古学者,更是一位典型的知识人,渊博而不囿于学科,对周遭的人、事、物,认知十分敏锐,因而常有独到创见,并时作惊人之语。这本综合记游、学术、怀古、思今的旅行杂记,也能让读者了解到,“跨界旅行”何以能够产生巨大的思想激荡与文化冲击。

《五墨共舞》



王维亚 著
西安出版社
2017年10月出版

该书是作者继“古长安碑刻说三部曲”《镌刻石头》《悟对西安碑林》《从石门到九成宫》之后,历时三年推出的又一部具有文学表达、学术气质的碑刻专题类文化散文作品。全书聚焦造像题记的这种艺术形式,对书画进行系统述说,深入研究其成因及流变,探讨其艺术风格,挖掘其审美价值,并将其放置在一个南北朝以至中国书法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探寻造像题记,有助于使其在当今的书法传承发展和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使人们更好地认识“魏碑体”形成的意义,及其对中国汉字书写在由隶至楷的节点上所起到的积极意义。

《我和我父亲的过去与现在》



姜博瀚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8年1月出版

这部小说描述了一场邻里乡党的明争暗斗,浓缩了洋河土地上的农民冷暖情仇,也反映了新旧两个时代的生死交替。作为老师的“父亲”要在红麻地上盖栋房子,故事就从“建造”开始,牵扯出了接连不断的矛盾,父子、婆媳、邻里、村镇之间的鸡零狗碎、阴暗算计、光明坦诚、生离死别都不动声色地纠结在一处,撕扯不清却历历分明——就像那块从不言说的红麻。文字里清脆的自信,源于作者对生活拥有的直接经验,令人动容。作品中透出的不仅有真情,更有深刻和智慧。